

中華學術系列

張天澤著
姚楠 錢江譯

中葡早期通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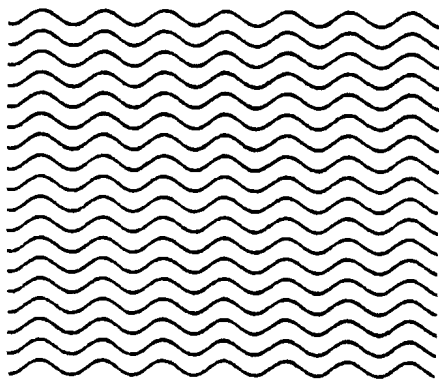


中華學術系列

中葡早期通商史

張天澤著 姚楠 錢江譯

中華書局





書名：中葡早期通商史
著者：張天澤
譯者：姚楠 錢江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24樓B3
版次：1988年1月初版
©1988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15 8

譯者序

自從地理大發現開始後，瓦斯科·達·伽馬自西歐繞道非洲好望角於一四九八年航抵印度西海岸，開闢歐亞新航線，時距我國的偉大航海家鄭和遠航印度洋已晚七十餘載。從此葡萄牙人的船隊就不斷東航，交換商品，獲利不貲，並於一五一一年佔領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奪取當時滿刺加（馬六甲）王國的首都和港口，遂又以此為基地，向東南亞其他各地歛取香料和各種寶貴物產，既壟斷貿易活動，又進行領土擴張。他們對地大物博、市場繁榮的中國，不可能不垂涎欲滴，企圖染指。因此，在侵佔馬六甲後不久，他們便航抵華南，開始進行其市易與殖民活動。由於明廷舉棋不定，地方政府措置失當，而葡萄牙人的舉動亦蠻橫無理，或時倨時恭，因此中葡之間的早期關係以中葡雙方的態度為轉移，時而友好和睦，時而兵刃相見，歷時甚久，但葡萄牙人的侵佔澳門，則不論其藉口如何，乃為眾所周知之事實。這個問題是中葡早期關係史中的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而中葡之間發生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則又為中國與西方各國關係的發軔。對此，我們不能不予以應有的重視。然而迄今為止，除正史與明清時代的叢書筆記以及清代印光任、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外，很少專著問世，未免為學

術研究的缺陷。

本書原名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直譯應為《一五一四年至一六四四年的中葡貿易：葡華資料綜合研究》，是張天澤博士在荷蘭萊頓大學的研究項目，寫成這篇論文，於一九三四年由萊頓 E. J. 布里爾有限公司（E. J. Brill Ltd.）出版單行本。正如原書序文所言，他得到萊頓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幾位名教授的指導，並提供大量資料，使他能完成這一科研項目。也正如原書題目所指出的，它是中葡雙方有關資料的綜合研究，其資料價值之大自不待言，其分析研究的精闢合理，也為學術界所公認。在當前中葡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時，把這本書譯出來介紹給中國讀者，我認為是十分有用的。因為本書雖說主要是講中葡早期貿易，但涉及面甚廣，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等各個方面，可供參考。中譯本為了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原意，改稱《中葡早期通商史》，想能為讀者所理解。

我認識張天澤博士是在四十五年前，關於他的生平和我們兩人的關係，後面還將提到。這裏主要講與本書原著有關的情況。起初，我並不知道張先生寫過這本書，他也沒有向我提起。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有學問的博士，因為一九四三年他在重慶時曾寫過一本專著，叫做《戰爭與經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三版出書後，他要我寫一篇評介文章。我拜讀了他的大作，不揣謏陋，寫了一篇書評，刊載在原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出版的《經濟滙報》第八卷第十二期。後來我從國外其他刊物中，見到不少人引用張先生這本有關中葡早期關係的著作，才知道他是研

究中葡關係的專家。到了五十年代，著名西域南海史地研究權威人士之一馮承鈞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五編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收有著名法國漢學家、東方學家伯希和（P. Pelliot）在《通報》（一九三五年）發表的一篇書評，馮先生把其中一部份譯成中文，題為《澳門之起源——摘譯伯希和評張天澤「明代中葡貿易關係」》，這才更引起了我的注意，想找到原書一讀，可是直到前幾年才能如願。為什麼我那麼晚才看到原書，當然有主觀和客觀原因，我甚至懷疑伯希和評論的那本書，是否就是張先生的這本書，讀了原書後，才知道《明代中葡貿易關係》也不過是原書名的意譯，這從原書所寫的時期一五一四年至一六四四年（明正德九年至崇禎十七年），即可說明。伯希和的評論，首先肯定了張先生有新的見解，但對澳門的起源等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我沒有讀過書評原文，但從馮承鈞先生摘譯的那部份來看，這位研究西域南海史地的法國權威似乎也沒有作出肯定的結論。因此，張先生的論證，在學術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可供研究澳門史的學者進一步探討。

本書中譯本是由錢江碩士與我合作譯出的。錢君譯成初稿，我負責校改定稿，譯文如有疏漏錯誤，應由我負責。我們在譯本中加了一些「譯者按」和「譯者註」，其目的在於：一、補充原書之不足；二、糾正原書個別錯誤；三、便於讀者閱讀引文原文。我相信這些按語和註釋也許對讀者有些用處。又原書僅有文字而無插圖，為使讀者對當時情況有更深的印象，中譯本中還附加了插圖若干幅。在這裏，我要向中華書局香港分局諸先生表示感謝，因為在他們的扶持下，本書中譯本才有出版機會。對於在翻譯過程中協助我們的幾位先生，也謹致以謝意。

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書的翻譯出版，也是爲了紀念張天澤博士與我的友誼，因此在結束本文前，講一講張先生的生平簡歷以及他與我的關係，看來不會是多餘的。張先生原籍福建，中學畢業後於二十年代升入燕京大學攻讀文史，成績優異，畢業時獲得學校最高獎品金鑰匙，意爲獲獎者可以開宇宙知識的寶庫。後來他就由哈佛——燕京資助，出國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其夫人爲瑞士籍，據原書序言所云，她曾協助完成本書的英文稿。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張先生已回國，隨商務印書館遷至重慶，與王雲五先生合作，任該館編輯部主任。他的夫人留在上海，因係中立國僑民，未遭迫害，曾爲接濟盟國僑民，出過大力。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賢伉儷重新聚首，創辦中國圖書出版公司，但經營時間不長。張先生在戰爭告終前後曾一度從政，新中國成立後又一度經商，直到新加坡南洋大學創立後，乃任該校文學院院長，退任後赴歐，旋至夏威夷大學任高級學者（Senior Scholar），六十年代卒於其地。對於張先生的求學經過和戰後在國外的情况，都是近幾年我從友人處獲悉的，所以可能有些出入，但大致無誤。至於我和張先生的關係，我在別處已經講過（見《星雲椰雨集》，新加坡新聞與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版；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日《根》版），這裏不再詳談，只想概括地說幾句。張先生和我既是學術研究的同道，又是私人交往的至友。我爲他惋惜的是，他在國際學術界有相當受人重視的地位，學問也很淵博，但他未能以畢生的精力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給後人留下更多著述。也許他在晚年重操舊業，但我不知道，因爲在新中國成立後，我就未能與他見面或通信。據他的同學新加坡許甦吾先生告訴我，張先生在新加坡工作時曾寫過他們的老

師安禮遜牧師傳。許先生曾將此書寄贈，但我一直沒有收到過，所以在這裏無法評說，按張先生的學術水平講，那本書肯定是有史料價值的。另外，我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擔任原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校長時，曾敦聘張先生為兼任教授，可惜當時他只開一門荷蘭語課，我並未請他講中葡、中荷早期關係史，實為遺憾。

在我的學術研究同道和好友中，已有四位去世。他們就是許雲樵、張禮千、張天澤和蘇繼顧。前面兩位在東南亞研究方面曾與我合作多年，後面兩位是商務印書館的高級編輯人員，不但本身對東南亞研究感到興趣，而且支持我們的科研成果問世。因此，我對他們四位永遠懷念，決心完成或繼續進行他們所未完成的科研項目。一九八一年，我校閱了蘇繼顧先生的遺著《島夷誌略考釋》，並寫了前言，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張天澤先生的這本大著，現在總算譯註完成。還有張禮千先生想做而未做的工作《海島逸志》校註以及許雲樵先生譯註的《馬來紀年》的修訂增補，也都已列入我的二作日程之中。多謝國內外出版社的支持，青年學者們的協助與合作，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實現我的願望，以慰亡友於泉下。

姚楠（梓良）

一九八七年三月於上海

原序

歷史上中國與葡萄牙的貿易儘管有其重要性，卻是個迄今為止爲人們所忽視的課題。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儘管現存的資料很重要，可是這些資料都散藏在諸如中文、葡文、以及（在某種程度上）荷文的典籍中，這些資料不僅西方歷史學家沒有多大研究，即使中國的學者也不熟悉。然而，唯有將所有這些史料進行綜合分析，我們才能指望最全面、準確地研究這一課題。中文方面的史料以往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葡文史料中雖說有些部份廣爲人知，但對這部份史料的探討也很不充分。

一九三〇年，曾一度擔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的洪業（煨蓮）教授首次使我注意到這個領域。他還告訴我，在哈佛大學的圖書總館內收藏有大量葡萄牙文與西班牙文的著作和手稿。於是，我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從西班牙動身前往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並在那兒完成了這項研究工作的大部份內容。

我衷心感謝萊頓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 J·赫伊津加（Professor J. Huizinga），因爲我在萊頓期間，他熱情地指導我的研究工作，並且是本研究項目的導師。我還必須感謝中文教授兼

萊頓漢學院院長戴文達博士（Dr. J. J. L. Duyvendak），承蒙他費心閱讀了我的文稿，向我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並讓我隨意使用他的圖書館。我還要深深感謝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 A. P. 厄謝爾博士（Dr. A. P. Usher），他仔細地審閱了我的文稿的前四章，向我提供各種線索，並在各方面給予寶貴的幫助。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 R. P. 布萊克教授（Professor R. P. Blake）對我的工作感到興趣，允許我在圖書館內享受種種特殊的待遇，對此我也深表謝意。

我非常感謝丹尼斯·D·邁耶斯夫人（Mrs. Denys P. Myers）和戴文達夫人（Mrs. Duyvendak）為我校訂文稿；感謝張夫人為我審讀、訂正校釋，並編寫索引。最後，我要對哈佛——燕京學會負責人表示感激之情，感謝他們對我進行這項研究工作所給予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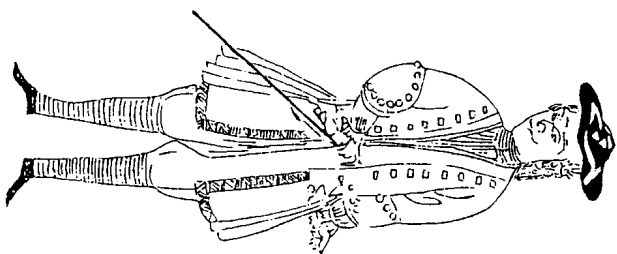
張天澤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於萊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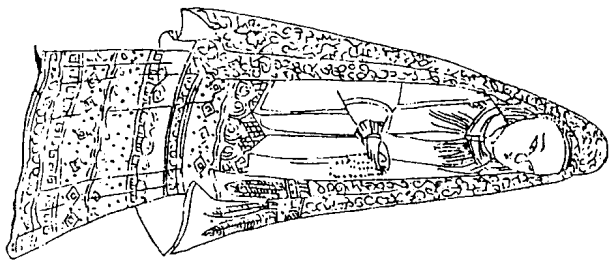


側面澳門圖（載《澳門記略》卷上）

男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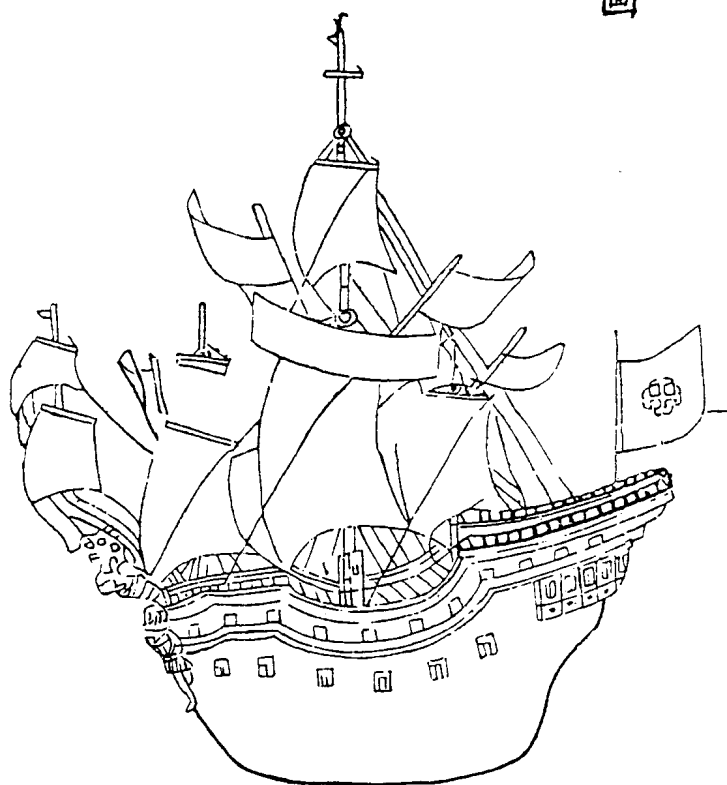


女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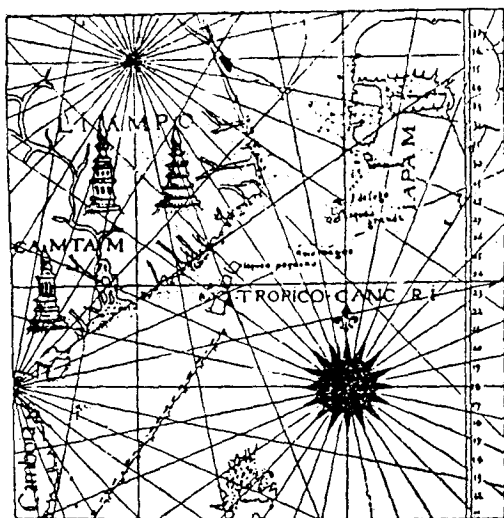


於十六世紀到達澳門的葡萄牙人（載《澳門記略》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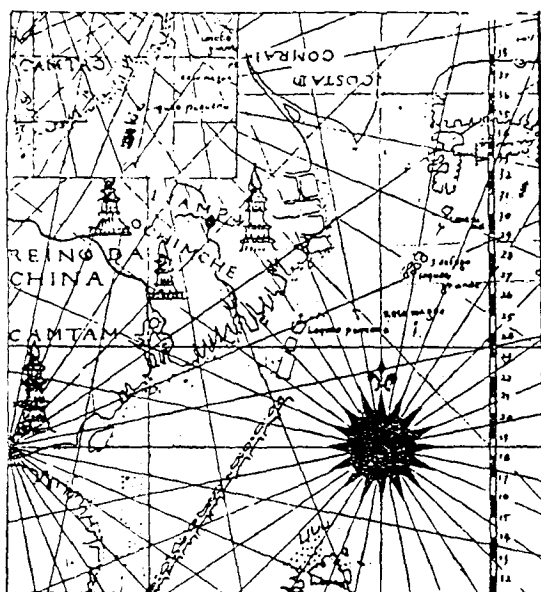
洋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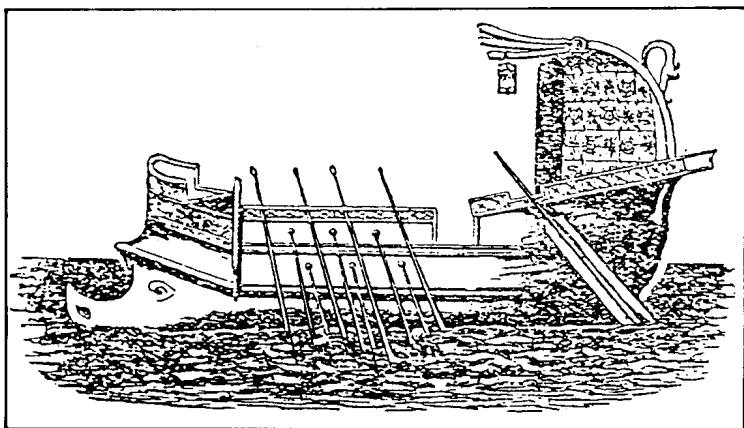
《澳門記略》下卷之洋船圖



1568年(明隆慶二年)繪之遠東圖局部。圖上 Liampo 代表浙江，下爲廣東，最南爲東埔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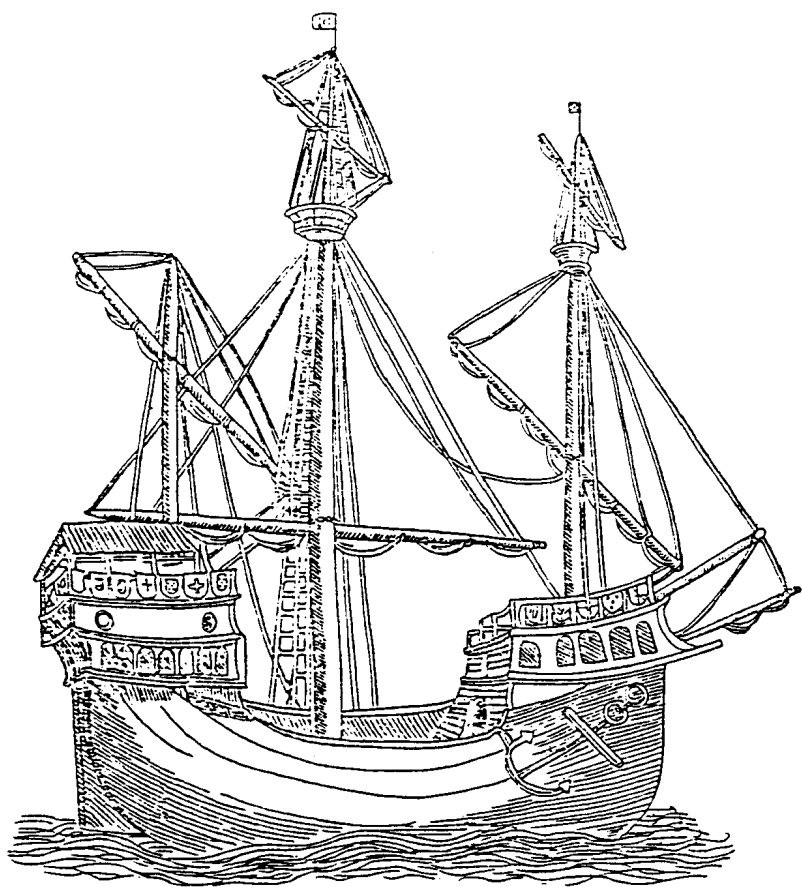
1571年(明隆慶五年)繪之遠東圖。與上圖同見於1935年里斯本出版之《十五、六世紀葡萄牙之製圖術及製圖師》。



$$\frac{1}{2 \mid 3}$$

1. 公元二世紀初的羅馬船舶（參見本書第 2 頁）
2. 公元九世紀唐朝召見使節圖（參見本書第 8 頁）
3. 元世祖忽必烈像（參見本書第 18 頁）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艦隊的戰艦
(參見本書第38頁)